

文史资料选编

第二十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北 京 出 版 社

文史资料选编

Wenshiziliao Xuanbian

第二十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5印张 211,000字

1985年11月第1版 198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200

书号: 11071·476 定价: 1.85元

文史资料选编 第二十六辑 目 录

纪念“一二·九”运动五十周年

“一二·九”运动的前奏

——回忆“九·一八”后的学生抗日运动……………吴世昌（1）

附：有关对日和战问题的通信三件……………（27）

“一二·九”运动回忆片断……………雷洁琼（33）

“一二·九”运动中黄敬同志二三事……………王 林（38）

“一二·九”运动及其余波……………陈 希（44）

文立微烈士的两封信……………文立微（86）

《五石斋日记》摘录……………邓之诚遗稿（92）

一九三六年清华被围记事……………冯友兰（96）

女二中学生在如火如荼的斗争中……………聂元素（100）

活跃于“一二·九”运动中的女一中……………耿精一（106）

回顾“三·三一”抬棺游行……………葛佩琦（111）

冲破沉寂 奔向斗争洪流

——忆“一二·九”运动中的北平医学院……………唐 诃（118）

“一二·九”运动中的北平师大……………武尚仁（124）

“一二·一二”示威游行亲历记……………梁建华（141）

不畏强暴 雪耻救国

——记“一二·九”时期东北大学女学生……刘宁元 (145)

“一二·九”运动为东北军输送了新血液……陈大章 (157)

投笔从戎卫社稷

——记北平学联向太原输送革命力量的经过……陈振中 (162)

北平晋绥代表团赴绥劳军记……梁寒冰 (166)

北平爱国人士的抗日救亡活动……张勃川 (169)

我随溥仪十四年……爱新觉罗·毓昂 (171)

清宫御寿两膳房遗闻……爱新觉罗·恒兰 (208)

记容龄谈西太后轶事……荣 涛 (225)

西太后的珍禽——五色鹦鹉……朱海北 (231)

舞台生活八十年(下)……侯玉山 (234)

六必居的创建年代及其

匾额考……叶祖孚 任志 沈鸿娴 (287)

我作燕子李三辩护律师的回忆……蔡 礼 (297)

“一二·九”运动的前奏

——回忆“九·一八”后的学生抗日运动

吴 世 昌

前 言

今年是“一二·九”运动五十周年。一个政治运动的起来，必有它的前因与后果。影响中国历史的“一二·九”运动亦如是。

现在年纪较大的人有的曾参加了“一二·九”运动。有的虽未参加，却也亲见亲闻这个运动的过程。但欲溯本求源，恐怕知运动前因者就未必如知后果者多了。我在“一二·九”运动前后的十来年中，几乎全部时间生活在北京，切身感受到发生于此次运动之前的“九·一八”事变乃是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并给当时的北平的政治形势造成重大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一九三一年，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三省，以致造成连续十四年的中日战争，中国同胞因之而死亡六千万人，财产之损失更不可数计。可知“九·一八”事变，实为尔后“一二·九”运动的直接原因。但现在谈到“一二·九”运

动这一历史事件时，人们很少谈到甚至绝口不谈“九·一八”这回事；仿佛“一二·九”是无因而起的一次学生运动，那就未免太偏颇了。事实真相是：在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之前，东三省全部为日军侵占，华北五省闹伪自治，北平的郊外通州已成立了日军保护下的伪政权。中国学生从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起，即成立抗日会，组织学生军队，卧轨请愿，数十万人从全国各地涌到南京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其规模之大，影响之广，是中国历史上学生运动所少见的。“九·一八”所激起的学生运动断断续续，此起彼伏，进行了四年多，乃有“一二·九”运动的发生。所以，“九·一八”是“一二·九”的前奏；“一二·九”则是整个中国学生救亡运动的一部分。今之青年读者，对“一二·九”也许已经耳熟能详，但他如欲了解“一二·九”的全部情况，那就不能只看有关“一二·九”的书而不看有关“九·一八”的书。现在系统地论述“九·一八”事变的书很少见，如此则“回忆录”一类的材料似可暂承其乏。

回忆录不同于历史，这是显而易见、无须解释的。它不必如编年、列传、大事记等须有一定之体例，可以随回忆所得而有详略、有多少。回忆录可能有误，个人回忆所得又时常挂一漏万，而这所“挂”之“一”，亦难免带有片面性。

我这里所回忆的，虽都有国家大事作框框，有的材料还核对过当时的报刊，但我仍不敢说它完全正确，我只是力求无过。我说这些话，好象预先为自己文过饰非，

但行文的无心之过与有意伪装，读者还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这里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每一个回忆录或别的自传体文章的作者都要碰到的。既是回忆录，自然是自己回忆自己录。如果把自己工作的成果，或为别人公认的优点写出来，那是自己作“广告”，用“文革”的术语，叫作“突出个人”。问题就出在这里，既要写自己的回忆，而又不许“突出”回忆者，那怎么办呢？难道把自己写成一个幽灵，在若明若暗的空间浮动？写回忆录有此困难，写自传尤其如此。因此，有些刊物要我写自传，我只好说：不会突出，敬谢不敏。但，我在燕大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搞学生运动的回忆录，虽然是“回头五十年前事”，我却因为事关国家大事，不便“敬谢”；知我、罪我、笑我、骂我，我也顾不得许多了。

一、“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进古都北平

五十四年前，即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是星期六。这天下午，我手里捧着一个淡青色的汝窑小花瓶，连同刚才在宣外杨梅竹斜街一家小木器作坊里配好的乌木座子，走出街口，正低着头看顾手中的盗器，却被对面来的一个同学，抓住我的手臂。他一脸严肃，劈头问道：

“老吴，你听见了消息没有？”

“什么消息？”

“日本关东军侵占了沈阳！”

“报上没有登。”我大吃一惊，将信将疑地追问下去。

“是的，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变。日军已占领北大营和兵工厂，

消息确实可靠。”这位同学是从东北大学转到燕京大学来的，对东北情形相当熟悉，他得来的有关东北的消息使人不能不信。我象被浇了一头凉水，对什么汝窑花瓶，配得恰好的乌木座子，全失去了兴趣，匆匆赶回东城大羊仪宾胡同二十九号，对家兄（吴其昌）说了，大家一肚子气愤。他忍耐不住，自己出去打听消息了，也没回来吃夜饭，几乎到半夜才回家。传来的消息不一：有的说日军不战而占沈阳，有的说巷战很激烈，但北大营和军火库被日军先占了，只好退出。不论其他消息如何，总之沈阳被日军侵占这一点似乎是确定的。以后又陆续从各处透露出来的消息，说是我军没有抵抗，日军未费一枪一弹而占沈阳，又扩大占区，全部占领沈阳附近的重要据点。

沈阳当时是东三省的首府，本来是张作霖割据的地盘。张作霖于一九二八年六月自北京退出回沈阳时，在离沈不远的皇姑屯被日军预埋在铁路下的定时炸弹炸死。张作霖死后，东北政权由其长子张学良继承。这位“少帅”和日本关东军是有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的。但论实力，他远远不是日军的手。日本关东军驻守东北主要交通线，名为保护南满铁路，实际上是东北的太上皇，经常向张学良提出侵害我国主权的无理要求。张学良无力拒绝，也不愿答应，只好敷衍、搪塞、拖延、躲避了事。关东军对于张学良这种态度当然不满。

“九·一八”事变发动之前，张学良在北平。他的大部分军队在关内，所以沈阳相当空虚，也无人坐镇。

张学良之所以离沈阳而来北平，也可以说是上了蒋介石的当。蒋介石从一九二七年背叛革命以后，继续“北伐”。但在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他的“国民革命军”抵济南时，遭到日本驻军的阻

挠，发生了“五·三”济南惨案，无辜市民被日军屠杀者数百人。日本在济南本无驻军，但为了阻止蒋介石的军队北进，遂以“保护日侨”为名，从青岛调动日军到济南。日军阻止了国民党军由津浦路进取京津的行动，国民党军派到日军中去的外交人员蔡公时，竟被日军残酷地肢解而死。国民党军于是改由京汉路自汉口经河南、石家庄规取北京（彼时尚未改称“北平”），但阎锡山的军队乘机从山西抢先开到北京，又阻止了蒋攫取京津，因此引起了后来一九三〇年的阎冯对蒋的中原大战。这场战争持续了半年多，不分胜负。山西军在一九三〇年攻克济南，直趋徐州，国民党军渐难支持下去。在此形势下，蒋派到东北去的吴铁城说服了张学良，东北军遂沿传统的路线经锦州入山海关，使阎冯军队腹背受敌。阎锡山只好退回山西老家。冯玉祥则照例“下野”。蒋介石为酬报张学良进军关内驱走阎冯军队之功，封他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他的部下遂不再称他为“少帅”，而称他的新尊号“副座”（当时称蒋为“委座”）。

张学良及其部下一进北京，五百年故都的文物风光当然是沈阳远远比不上的。蒋介石既然委他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其分会就设在北平，张的公馆则设在顺承王府（即今全国政协所在地）。蒋介石对张实行羁縻政策，把张稳住，在北平，既减少了张回沈阳经营东北以致养成割据势力的顾虑，又可以直接和东北的各派势力挂钩，使他们直接效忠于南京。日本对于张氏父子和其各派势力是有能力控制的。南京政府如果觊觎这一块就在它口头的肥肉，关东军是不能容忍的。

蒋介石在击退阎冯的联合势力，借张学良东北军之力“收复”平津以后，俨然有“汜可小康”的形势。但他因连年用兵，不注意

长江水利工程，这一年（一九三一年）夏天长江大水灾，汉口街道上多用船只作为交通工具，附近有的县则沉在水底，估计死人以百万计。当时全国正呼吁救灾，长江水势尚未退尽，幸灾乐祸的日本侵略军，就乘此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攻入沈阳，遂成为以后持续十四年之久的中日战争的起点。

九月中旬的北平，正是雨季已过，溽暑初退，天高气爽，不寒不热的好天气。国民党政府迁都南京以后，改北京为“北平”，意谓北方从此被它平定。于是从北京伸展出去的各项铁路，本来定名为“京汉”、“京绥”、“京沪”，一律被国民党政府改为“平汉”、“平绥”、“平沪”。但到东北去的“京奉”路，因不再用“奉天”旧名，照例要改为“平辽”。张学良不愿为蒋所“平”，就改称“北宁”。

北京改为北平以后，已不是政治中心，也没有象样的工商业，赖以支持的只有一些学校和其他文化机关，如两个国立研究院（北平研究院、中央研究院）、不少图书馆、科学调查所（静生生物调查所、地质调查所）、故宫等博物院。因为没有“甚嚣尘上”的政治风波，环境安静，是读书和做科研工作的理想城市。所以北平变成了全国的文化首都。这里不但有全国最老最多的大学，而且也是文化水平、科学水平最高的大学集中地。许多南方的学生都到北平来念书。并且，由于“五四”运动的深远影响，北平的学生虽然远离政治中心的南京，在沉静的科研环境中，却并没有忘怀自己苦难的祖国。尔后的各次爱国运动都由北平学生领导发动，即足以证明这一点。

清爽的九月，正当各校开学时节，也是最理想的读书天气。但文化首都北平的沉静的读书空气，并不能永久保持下去。

一九二八年秋，我同时考入清华大学西洋语文系和燕京大学

英文系。清华大学因当时国民党各派争夺校长，推迟开学，我只好先进了燕大。按当时学制，除医科外，各系都是四年毕业。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二年是我的最后一个学年，也是最吃紧的一年。尤其是因为我选定了毕业的学士论文为《吕恰慈的文艺批评学说》，而此公的英文读起来实在别扭。过去我学英文系并不专心（因此系教师都由原先的美国传教士充任，水平不高），常到别系去听课，耗费了不少时间。现在到最后一年，非下决心用功不可了。但是我的决心被沈阳来的消息破坏了！敌人已经破门而入，怎么还能安心读书！

二、燕大成立学生抗日会

星期一早上，我回到燕大。大家一如过去学期伊始时那样，正紧张地进出图书馆或课堂。未名湖畔的秋柳，还象往常一样悠悠扬扬，万缕千条拂石船，好象整个燕大还没有听到“九·一八”事变的消息。

我找了两张大白纸、一瓶墨汁（这些文具是学生会长备的），也不起草，提笔就写了一张带有“煽动性”的《告全体同学书》，一式两份，一份贴在图书馆前的布告牌上，一份贴在第一宿舍（现在的德斋）入口处的布告牌上。我批评了有些同学对国事毫不关心，也批评了有些绅士式教授，“只要三百元薪金无恙，一家子人口平安，国家亡了也不关痛痒”的观点。我说：“国家亡了，只要有志士仁人，还是可以复兴的。哀莫大于心死！所谓士大夫阶层对国事如楚人视秦人之肥瘠，这才是最大的耻！耻！耻！”末了，我呼吁同学们起来，采取行动，“赞成者请签名”。不久即有许多人围着签名。

我旋又溜到清华去看看情形。那里也是冷冷清清的不见动静。回校时将近午饭时间，图书馆里散出来的同学在看《告全体同学书》。也有人就在这张大纸的边上写些小字，表示赞成或反对书中的“煽动”。不到两天，报上消息也已传开。全校沸腾起来了，许多同学纷纷贴出“公开信”，要求学生自治会召开全校大会讨论局势。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大多是国民党，和校方关系搞得不坏。学生自治会是全校同学选举的，抗日行动理应由它进行组织。但事变以来近半个月，却毫无作为（除了“停止娱乐”及臂带黑纱）。同学要求召开全体大会，另组抗日委员会。学生自治会遂不得不于十月初召集全体大会。

大会是由学生自治会召集的。以前学生自治会也召集过别的会议，讨论有关全体学生的事情。但燕大学生的自由主义特别严重，除了读书玩乐，对别的公共事情大都不感兴趣，因此，开会常因“不足法定人数”而“流会”（开不成）。可是这次全体大会，同学们都踊跃参加，大礼堂中八百个座位早已坐满，连两边窗台上也都坐满了人。开会时群情愤激，大家慷慨陈词，有的同学提议立即罢课游行，反对“不抵抗”政策（当时以为张学良知道日军要发动战争，下令不抵抗而撤退）。但也有国民党的稳健分子主张“慎重”，“爱国不忘读书”，反对罢课游行。大会结果，否决了由当时掌权的学生自治会主持抗日工作的提案，另行组织由全体大会直接自由提名选举出来的学生抗日会。当时决定选举抗日委员十一人，以得票最多者为主席。选举结果（假如我没有记错）如下：吴世昌、杨绛（女，即杨刚）、张德生、史国雅、董文田、卢惠卿（女）、周振光、刘纪华（女）、谭诒英（女）、叶楚生（女）等任委员，其中吴世昌任主席。大会并通过以下议案：下一个星期某

日罢课游行，借以唤起民众，抗议日寇侵略我领土，同时要求南京政府出兵抗日御侮，并罢免不抵抗的封疆大吏，处之以丧失国土罪(当时尚不知道张学良是奉蒋介石之命不抵抗日军的)，以及要求政府全力抗战等。

三、第一次抗日游行

全体学生大会议决案中别的还都不成问题，唯有罢课游行一项是燕大当局所不能容许的。因为燕大自建校以来，素以“学风纯正”著称，从来不曾有过罢课游行等“不轨行为”。所以，达官贵人、军阀富商的子女，都被送到燕大来“好好念书”。当时校务长司徒雷登^①正在美国筹募燕大经费(因自一九二九年美国经济萧条以后，燕大经费来源大减)，如有重大校务则临时组织一个委员会处理，由年高德劭、素称谨厚的教育系主任高厚德(Gall)代理校务长。校务委员会听说学生要罢课游行，立即召集紧急会议讨论此事，并通知我代表学生抗日会列席此会，报告学生全体大会开会及决议经过。其实学生开大会时，学校当局早已派人参加听信，备知一切，要我汇报无非是要留下一个正式记录，以便以后引用时可以说：据学生抗日会主席某某报告云云。同时校务委员也可以借此机会向我提出问题。到会的校务委员，除文、理、法三院院长、各系主任外，也包括一些美国教授。他们虽不赞成罢课游行，但对于学生的爱国情绪都表示同情和理解。只有一个例外，那是经济系讲师、代理法学院院长陈其田。别人提

^① 司徒雷登本为燕大校长，英文名称为 President，后因国民政府不许外国人为大学校长，乃聘前清翰林吴雷川为校长，译名 Chancellor，司徒仍保持英语原称，中文则译称校务长。

问时都站直身躯，用严肃而和善的口气发言，有时也表示为学生的困难考虑问题。唯独陈其田，欲站不站，把身子斜靠在桌上，用极端轻蔑鄙夷的口吻，歪着嘴巴问我道：

“你们昨天的会到了几个人呀？够不够法定人数呀？这样的会算不算合法呀？对全校学生有约束力吗？赞成罢课游行的有几票？这些赞成票中，有多少是你们布置好的？”

这显然是存心侮辱，以小人之心度八百多青年之腹。他说话时那种鄙夷的神气，连别的教授都不自觉地对他侧目而视。

我说：“陈先生所提的都是学生团体内部的问题，不是今天校务会议所要知道、所要讨论的问题。陈先生没有资格问我这些问题，我也没有义务回答他。不过他既然提出来了，我不说好象我理亏，所以不妨说几点：第一，昨天大会到会的人数，不是几个人看见，而是上千人共见的。够不够法定人数，他可问任何人，不必在这个会中提此问题（有的美籍教授点头）。第二，每一件提案表决时票数的多少，够不够法定票数，大会文书处自有记录。陈先生如要去查核，他随时可以去查，一个人去可以，带了律师去也可以。第三，陈先生所谓‘事先布置’的问题，谁都看见，这个全体大会本来是由学生自治会召集的。他们事先有无布置，陈先生可以去问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后来到会同学临时动议另外成立抗日会，临时提名选举，这些手续都是坐在主席台上的学生自治会职员办的。我们被选为抗日委员的都四散坐在台下，有一半被选的人直到选出时我还不认识，因为不是和我同系或同班的，素无来往。有无‘布置’问题我说不上来，还是请陈先生去问召集大会的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吧。”

我一说完，陈其田拿起帽子就走。以后对学生的抗日活动，

他再也不出头捣乱了。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件，日军占领燕大后，燕大许多教职员被日军关进监狱（如陆志韦、洪燮莲、张东荪、司徒雷登等）或送进集中营（如谢迪克），但陈其田却和日军宪兵队合作得很好，还升了官。此是后话，兹不赘述。

燕大校务会议不许罢课游行的布告出来了。措辞很委婉郑重，劝学生在国难严重时期更不可荒废学业。学生抗日会只执行全体大会的决议，根本不理睬学校的布告。大家筹备罢课游行很紧张。学校想再一次通过个别抗日会的委员，破坏罢课游行的计划。又因为预定的罢课游行这一天，正是开学以后第一个月终，正是要举行月考的考期。于是就有人扬言，说这次罢课是为了躲避月考。这个说法在西籍教师中颇引起反感。我们了解这些情况以后，召集了一个短促的全体大会，要求全体同学在游行完毕后第二天照常参加月考，以后照常上课。这个提案在大会中通过并且公布了，这样才消除了所谓“罢课为避考而非为爱国”的流言。

到了决定游行的前一天上午，代理校长高厚德博士把我找了去。他转弯抹角说了半天，意思是要我再召集一次全体大会，以取消这次游行。

他说：“你在同学中很有威信，既能够说服他们游行回来照常考试，你也可以说服他们索性取消这次游行，因为北平别的学校都没有罢课游行。燕大是美国教会办的大学，何必干这个国立大学还没有干的事？我知道只有你能取消这种荒废学业、不符合燕大传统的行动。”

我说：“学校不能取消这次游行。我也不能说服同学们这样做。他们同意游行完了考试，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避考’之意。爱国是每一个人的天责，人人可以领先。国立大学不发动，燕大

为什么不能先发动？”

他看我很坚决，知道软话劝不转，只好“图穷而匕首见”了。
他把脸一沉说：

“Mr. 吴！燕大优良的传统，不能由你们轻易破坏！司徒博士把这事看得很严重。我受他之托，责任也很重。我要提醒你，Mr. 吴，你这一年是最后的一年，只有八九个月你就要取得学士学位了。你即使不管燕大的传统，也该考虑你一生事业的起点。”

我知道他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笑起来了。我说：“高厚德博士！你知道吗？我近来学会了刻图章。”

“这和我们正谈着的问题有什么关系？”

“有一点关系。”我说，同时把牌摊在桌上：“我准备在必要时刻一颗图章，文曰‘燕京大学开除学生’。”

他呆了一下，但立刻回复原状说：“我知道你是不在乎文凭或学位的。但你应该考虑你的十个同事（指抗日会的其他十个委员）的利益。”

我说：“学校准备开除全体抗日会委员吗？那好极了！从此燕大学生倒真会有一个光荣的传统了。你们开除十一个抗日会委员，他们再选举十一个。再开除，再选举，你到哪一天能开除完毕？并且，你忘记了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前车之鉴了吗？你知道不知道上海光华大学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我说完就要走。

“Mr. 吴，等一分钟。”他还想劝告。

我说：“我忙着呢，为筹备游行，昨夜几乎通宵没睡。你等着看报上燕大学生首先游行的消息吧，我等着看布告牌上开除全体抗日会委员的消息。”

彼时燕大一共只有八百个学生，游行队伍并不长。从西校门

到城里，也比清华近些。为了阻止有人不去参加游行，借此玩一天，抗日会组织了纠察队。队伍排好后，纠察队派人到各宿舍查看，各教室用大锁都锁上了门。出发时，每人手里拿一个长方形或三角形的小纸旗，上面写的标语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驱逐日寇出沈阳”、“还我河山”、“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抵制日货”、“反对不抵抗主义”等口号。名义上由张学良负责的北平军分会，设在府右街路西几所大楼内（现在统战部和文史馆一带）。游行的队伍经西单往东，到军分会前面的空地，那里约有一连张学良的卫队。他们把步枪搭成三支一组的许多三角架子，士兵自己却徒手坐在地上，仰着脖子看学生一面走，一面把小旗在他们面前晃来晃去。学生们又齐声高呼口号，但他们仍坐着，木然无动于衷。估计他们是奉命静坐，不许作声的。可见张学良的卫队比段祺瑞的卫队高明。沈阳失守，张学良当然有责任，但把“不抵抗”的政策归之于张，使当时全国人民痛恨张学良，则完全是蒋介石的诡计得售。平心而论，失沈阳之罪，蒋介石远远超过张学良。不过当时的学生当然不知道，张学良不敢公布真相，透露“不抵抗”是蒋的命令。张学良哑巴吃黄连，有苦“不许说”，比“说不得”还要难受。

这次游行，我们虽然在张学良的卫队面前大喊激烈的口号，但没有象“三·一八”那样出什么乱子，平安而回。这使原先反对游行的教职员，也不能不承认学生的组织才能和控制能力。

燕大的游行，当然引起了连锁反应。接着是清华、师大、北大等校也纷纷发动。接着是上海、南京、杭州、广州各大中学校的同时响应。燕大学生的罢课游行，从召集大会，产生抗日会到上街游行，据我所知全是自发的，没有任何外来的领导。后来响